

关于古代文学如何反映时代精神的讨论

最近，我校举行了第五届科学讨论会，中文系师生就我国古代文学如何反映时代精神的问题进行了多次热烈的讨论。在讨论中，大家一致批判了周谷城的“汇合”论，指出他所谓时代精神“自始就包括对立两方面的思想”的说法，是宣扬阶级调和、抹煞阶级斗争的论调。这实质是反对当前兴无灭资的斗争，为资产阶级思想的长期存在寻找理论根据。同时，也歪曲了历史事实。

在讨论中，争辩较多的有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一、什么是时代精神。

绝大多数同志认为“时代精神”是站在时代前列、推动社会发展的革命阶级的革命精神。具体说来，它是指奴隶社会里的奴隶阶级、封建社会里的农民阶级、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工人阶级反抗斗争的革命精神。此外，它还包括上升时期的新兴剥削阶级的革命精神。而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最能表现时代精神的是革命的农民阶级。

有个别同志不完全同意上述意见，他们认为上升的剥削阶级不能代表时代精神。因为既有剥削阶级存在，也有反剥削的被压迫阶级存在，而只有被压迫阶级的反抗斗争精神，才是时代精神的表现。他们还认为如果承认剥削阶级也能表现时代精神，那么，一个时代岂不有两种时代精神？

也有个别同志认为时代精神包含较为广泛的内容，认为只要反映了广大人民的理想、要求，就表现了时代精神。而有的同志的意

见恰恰与此相反，他们认为只有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精神状态才能算是时代精神。

大家认为时代精神的含义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如奴隶、农民、工人以及上升的剥削阶级，他们的理想要求、精神状况是各不相同的。因此，时代精神所包含的内容就有阶级的差异。

有的同志认为时代精神是个崇高的概念，不能随便套用在我国古代的作品中，不能把进步性、民主性的精华与时代精神的概念等同起来，具有进步性的作品不一定表现了时代精神。而有的同志则认为古代的“时代精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肯定某些作品有时代精神，只说明它在当时起过进步作用，并不一定对我们今天还有用，相反，还需对它进行批判。如资本主义的人文主义就是例证。

二、我国封建社会的文学是如何反映时代精神的。

一部分同志认为：

1. 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一般说来是最能充分地表现时代精神的。因为劳动人民最

能真切深刻地表现自己的理想愿望和反抗斗争的精神。如《诗经》中的《硕鼠》、《伐檀》，就充分表现了他们对剥削阶级的憎恨。这些

作品，立场鲜明，感情充沛，绝不是代言人的作品所能比拟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作品，在文学史上为数极少。这是因为：第一，劳动人民在封建社会里受着政治压迫，经济剥削，不能成为文化的主人，不可能用文字写下自己的作品；第二，文学史上的口头文学大都是经过统治者审查删定的，统治阶级对那些不利于本阶级利益的作品予以删削，而被保存下来的一些作品，也经过统治者的篡改和歪曲；第三，劳动人民也受剥削阶级思想意识、观点情趣的侵蚀，因此，作品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内容和宿命论的观点。文学史上保存下来的具有时代精神的表现了劳动人民反抗斗争、理想要求的作品就为数极少了。

2. 新兴剥削阶级为了建立比较进步的社会制度，对旧有的制度不断地加以批判和斗争，在斗争过程中，不断地歌颂自己的功绩，体现了这些内容的作品，也就表现了时代精神。如“周颂”中的《思文》、《臣工》、《噫嘻》、《载芣》和“大雅”中的《生民》、《豳》、《皇矣》等篇，体现奴隶社会周族统治者上升时期发展生产以农立国的精神；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诸子散文中的某些篇章，体现封建地主阶级在这场论辩中为推翻旧制度而进行理论建设的积极精神；近代的文学改良运动，体现中国资产阶级，为反抗封建而进行政治改良的斗争精神。从它们的本质来看，都是为剥削阶级利益服务的。但是，它们的矛头是指向已经腐朽的旧制度，企图建立比较合理的新制度，有利于推动历史前进。就这个意义来说，基本上符合劳动人民的理想、愿望和要求，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它们也能体现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

3. 进步的封建士大夫由于对统治者过分剥削压迫人们有所不满，因而能写出一些同情人民疾苦，揭示阶级对立的作品来。如杜甫的《三吏》、《三别》、《咏怀》和白居

易的《卖炭翁》、《轻肥》等作品，有的深刻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使人民过着悲惨万状的生活，有的则告诉人们“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阶级对立和贫富悬殊的不合理。读了这些揭露统治者罪恶的作品，就会使人从感情上同情被压迫的人民，憎恨压迫剥削人民的统治阶级，从而对统治阶级的经济基础起了破坏作用。因此，应该说，这些作品是体现了时代精神的。此外，还有一些描写爱情的作品，具有反封建、反礼教、反假道学的内容，是一种新的思想，因而也具有时代精神。

4. 我国文学史上表现时代精神最为强烈的时期，往往是阶级矛盾尖锐，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期。某些剥削阶级的作家由于爱国感情与民族自尊心的驱使，坚决主张杀敌卫国，收复河山，洗雪国耻；表现了与当时广大人民抗敌要求相一致的感情。因此，这些作品也就体现了时代精神。如南宋的陆游、辛弃疾的某些爱国诗篇，以及岳飞的《满江红》就是范例。

另一部分同志不同意上述的某些意见，他们认为：

1. 从理论上说，新兴的剥削阶级虽能反映时代精神，但我国封建社会的萌芽期、上升期、停滞期究竟如何划分，尚在争论。因此，也就不能断定那个时期的统治阶级及反映它的作品表现了时代精神。而上述“周颂”“大雅”中的那些作品，多为歌颂统治者的功德，思想内容很值得批判，艺术性也不强，在文学史上并不被人们重视，所以，不应当成为表现时代精神的作品。

2. 封建士大夫在阶级矛盾中，如果不能背叛本阶级的立场，站到人民一边，是不可能反映时代精神的。那些同情人民疾苦的作品，并未能算是反映了时代精神。因为封建士大夫只不过是给被压迫的人民给予一点人道主义的同情心，而没有站在人民的立场去

表现他们的理想要求和反抗斗争的精神；而被压迫人民的理想要求、反抗斗争应该是封建社会时代精神的根本内容。揭示阶级对立，指出贫富悬殊的不合理以及统治阶级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的作品，也不能说体现了时代精神，因为这些作品的作者只是把社会存在的两种不合理的现象告诉人们：一边是统治者荒淫无耻的生活。一边是人民的饥饿和死亡。作者并没有站在人民一边，去表现他们对统治者的刻骨仇恨与反抗的怒火。所以，我们也不能说他们的这些作品具有时代精神。

这些作品除了使人发出几声叹息、为苦难的人民流几滴同情的眼泪外，它只能使统

治者减轻一点对人民的剥削，从而帮助统治者缓和阶级矛盾，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

此外，有的同志认为我国文学史上各个时期表现时代精神是极不平衡的，有时比较强烈充分，如南宋时期的爱国诗词。有时比较微弱，如杜甫的《三吏》、《三别》只是勉强地勉励人民杀敌卫国。有时则成了空白，如汉魏晋南北朝时的文人作品。

还有的同志认为封建士大夫根本不能反映时代精神，陆游、辛弃疾、岳飞虽然在民族危亡时能写出一点好作品，但一接触到本阶级的根本利益时，就不能站在人民一边了。

三、岳飞的《满江红》是否反映了时代精神？

对封建文人及其创作能否反映时代精神这一问题，争论最为集中的是岳飞和他的《满江红》。

有的同志承认岳飞的《满江红》表现了爱国主义思想，但认为它没有反映时代精神。这是因为：第一，他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去充分表现人民的斗争精神，而是为了忠君去抗金，“收复旧山河”的目的是为了“朝天阙”。所以说，他的爱国实质是爱君，卫国的实质是卫君。忠于君主的爱国思想不能算是时代精神的反映。第二，岳飞镇压过杨么的农民起义，他与农民革命阶级的感情相对立，这样的作家，不能说他的作品反映了时代精神。

而多数同志认为岳飞的《满江红》比较充分反映了时代精神，因为词中表现的对敌人的仇恨蔑视和誓欲收复国土的精神，正与当时广大人民、农民阶级的情绪相一致。那时，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降低到次要与从属地位，农民阶级的迫切要求是击退异族的侵略，而不是杀掉皇帝。所

以，岳飞在《满江红》中表现的杀敌卫国的英雄气概正与农民阶级的精神相一致。如果我们承认农民阶级的革命精神和英勇无畏的气概最能表现时代精神，那么，《满江红》可以说是充分反映了时代精神的。

我们承认岳飞的《满江红》具有时代精神，并不意味着它完美无缺，对岳飞的忠君思想，我们应该严加批判，但也绝不能因此，就否定了他的《满江红》具有时代精神。这就需要我们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如果说，封建社会的文人没有忠君的一面，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去爱国，那岳飞及其他爱国作家岂不成了农民阶级英雄么！

对《满江红》的评价应与对岳飞这个历史人物功过的评价区分开来。我们说《满江红》表现了时代精神，并不意味着对岳飞应该全盘肯定。

《满江红》是我国文学史上少有的优秀作品，如果连《满江红》这样的作品也没有反映时代精神，那在我国文学史上文人的创作中

几乎就没有时代精神的存在了。

会议将结束时，还有一些同志提出一些新的意见和看法。他们虽不承认岳飞的《满江红》反映了时代精神，却认为皮日休、杜甫的某些作品反映了时代精神。理由是：皮日休大胆地提出：皇帝不好，可以扼死。这是任何封建文人所不敢触及的问题，是一种

强烈的叛逆精神。杜甫则能区分战争的性质，基本倾向同情人民，大部分创作又是积极的，所以能在创作中反映时代精神。也有同志不同意上述意见。

由于时间关系，问题未能深入展开，有待于今后继续讨论。（苏者聪）

关于明末农民战争问题的讨论

明末农民起义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是当前史学界争论的重点问题之一，其中许多方面都涉及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基本原理。为了提高思想认识，学会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历史系二年级同学最近以“明末大顺政权的性质及其失败的原因”为题，开展了热烈的讨论，现将讨论情况报导如下：

（一）关于大顺政权的性质问题

大多数同学的发言，都不同意孙祚民同志关于大顺政权是封建政权的说法。但在讨论中，一部分同学提出了另一种看法，他们认为大顺政权是一个不纯粹的、带有封建因素的农民政权，它的主要方面为农民阶级服务，次要方面为地主阶级服务。理由是：李自成在起义过程中和进入北京后，大量收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明朝旧官吏，而他们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意识并没有改变，他们是地主阶级在大顺政权中的政治代表。农民军将领必然受他们的影响而蜕化变质，因而在政策措施上也必然带有封建因素，象开科考试，只能是对地主阶级有利，为地主阶级服务。

但许多同学不同意上述看法，他们首先认为：政权就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专政的工具，政权的性质，决定于它的基本政策为哪一个阶级服务。大顺政权是在农民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建立的，它摧毁了代表地主

阶级专政的明王朝，镇压了大批明蕃王、勋戚、官僚、地主，一方面推行均田、免粮、散财济贫等保护农民利益的政策，另一方面又严格执行追赃索饷，不仅打击了官僚地主的经济势力，而且也打下了官僚地主的政治威风，在大顺政权控制的地区内，正起着倒转乾坤的变化。面对这大量的事实，既然肯定大顺政权是农民的革命政权，就是承认它是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那就不能说，它的主要方面是对地主阶级专政，而次要方面又为地主阶级服务。事实上，一个政权绝不可能同时代表两个敌对阶级的利益的。其次，农民政权本身的含义就已经与无产阶级专政相区别，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也必然在农民政权中反映出来，这就无所谓纯粹和不纯粹的问题。农民政权对敌人的专政，当然不可能象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彻底，但这种专政的不彻底，不能与政权性质具有封建因素混为一谈。至于大顺政权任用地主阶级